

五四后李大钊的儒学观再认识

胡庆祝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

摘要:李大钊不仅是当时传播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也是儒家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不仅在其所著文章中宣传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更在实践中践行着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精髓。探讨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待儒学的态度,不仅能真实地反映出李大钊对待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而且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儒学;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61;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2-0008-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2.002

A Reinterpretation of Li Dazhao's Confucian Views After May Fourth Movement

HU Qing-zhu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was both a pioneer in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modern China, and an inheritor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He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best part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but also carried it out in practice. The discussion of Li Dazhao's attitude to Confucianism after becoming a Marxist can reveal Li Dazhao's attitude to Confucianism and the enti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s of great value for carrying o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ltiv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Li Dazhao; Marxism; Confucianis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李大钊早期(1919年前)思想与儒学的关系研究较多^①,而对于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关注相对较少,而涉及到李大钊后期思想的研究论著中,在此问题

^① “在共和的第一年,李大钊的政治见解实际上是儒家道德观念和西方改良宪政理论的混合物”。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刘桂生先生论述了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中所蕴涵的儒学成分。参见刘桂生:《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224页。有学者指出,“把‘五四’视为‘断裂’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参见彭明:《彭明文存》,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51页。“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创新、超越方面,李大钊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参见吕明灼等著:《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18—362页。“李大钊在思想内容上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如:提倡科学的态度与思想方法等”。参见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47页。“李大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后,进而再去谙悉西学,在中国各项事业上显示出特殊的优势”。参见朱成甲:《李大钊传(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李大钊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攀升时期,李大钊所写的文章中,‘大同’等词汇是经常出现的”。参见蔡乐苏、王宪明:《论中共创始人思想中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因素》,《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观点驳正”(项目批准号:14JJD71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庆祝(1980—),男,黑龙江巴彦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上普遍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有的甚至错误的认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便“全盘”否定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一切传统文化^①。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对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待儒学的态度的变与不变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对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儒学、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其思想体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一、科学的孔子观

李大钊在新旧思想交融时期,对孔子及儒学采取了比较客观、科学的态度,形成了科学的“四维”的孔子观。

一是实在的孔子(孔子的历史):实在的孔子是“孔子之本身”。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指出,孔子对于其所生活的时代来说,是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圣哲”,也代表着春秋时期的道德。每一位“圣哲”的思想都要受到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圣哲”的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了其所生活时代的烙印。孔子生活在专制社会,所以孔子思想不可避免地代表着专制社会的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1]429}孔子思想受其生活时代的制约,本身固然有其局限性。社会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进步,孔子思想中的负面影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实在的孔子。

二是历史的孔子:与“实在的孔子”不同,历史的孔子则是被历代统治者不断改造,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子。“汉、唐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与宋、明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与现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与今日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亦不同了”^{[2]523}。李大钊用了三个“不同”阐明了孔子及其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被统治者“修改”,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孔子。在历史的各时期,董仲舒、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曾经改造过孔子;民国初年,历史的孔子又被袁世凯等改造,成为复辟帝制的思想工具。李大钊之所以要揭示出“历史的孔子”,是要“揭露几百年来统治者

和官僚强加在民众身上的一切伦理原则和制度,即揭露根据孔子原来的理论或冒充采用了这种理论而制定的那些不平等原则和制度的虚伪和残酷”^{[3]311}。

李大钊认为“历史的孔子”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经二千多年,并在人的心灵中根深蒂固,并不是孔子“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而是因为“历史的孔子”适应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农业经济,这是“历史孔子”存在的基础。孔子思想“是中国大家庭制度上的表层构造”^{[4]187}。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宗法社会是孔子思想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这就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历史的孔子”之所以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三是世界的孔子:李大钊认为,孔子如同西方的“圣者”苏格拉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思想不仅仅支配中国人的心灵二千多年,“日本、高丽、越南等国”也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可见,孔子有着世界性的影响。“日本、高丽、越南等国”之所以受到孔门伦理的影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经济组织与中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打孔”声浪持续不断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能提出“世界的孔子”的观点,应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且富有远见的,反映了李大钊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四是未来的孔子:孔子以“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日新之旨”的目的在于“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在李大钊看来,孔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存在着创造、创新的成分,可以做为新文化中的重要滋养。孔子产生于春秋末期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同样也可以产生出像孔子一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伟人。李大钊指出,与其过分地“怀古”,还不如积极地“畅想将来”,“古时”与“今世”都是人类创造的历史,创造出未来的黄金时代才是最重要的,从而创造出中国未来的孔子。

四个维度的孔子,亦即四个层次的中国文化,其中的三个层次是令人尊敬,给人激励,让人向往的。只有第二个层次,即被历代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的那个“历史的孔子”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亦即那些试图以孔子及儒家思想来控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统治

^① 史华兹认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成了与过去整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社会。”林毓生认为:“如果从历史角度对五四时期作一回顾,我们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显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特色。”详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第246页。

者,是需要“打倒”与“批判”的。李大钊对孔子不同层次的区分是非常科学的,从而把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区分开来,使儒学在批判中得以继承,在继承中得以发展。

二、对儒家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

著名历史学家刘桂生先生认为,“作为伟大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的李大钊,他的人格、思想、精神基本上由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熔铸而成”^{[5]218}。对于李大钊来说,儒家思想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李大钊所著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儒家文化。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探析李大钊对儒家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

第一,家国天下的情怀。无论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是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李大钊一直在践行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李大钊的一生“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李大钊一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导着人生实践。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对孔子政治哲学中“一以贯之”^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②的道德体系进行了客观评价。

李大钊认为“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③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4]146}。李大钊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正是以这种“健行不息”“只有前进,没有反顾”的精神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革命事业。李大钊更是以实际行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6]101}进行了最好的诠释。

第二,大同思想。《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提出了“大同”思想^④。《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大同”社会的构想,在李大钊的文章中频频出现。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

中,李大钊论述了人类进化的轨道,就是要通过“世界大同的通衢”达到世界思想联贯的脉络。在个性解放的同时,还“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在世界大通的今天“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7]397}当世界人类组织的联合,国界被完全打破,人类所期盼的世界大同也就随之而来。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曾发表于《新潮》第2卷第2号上,李大钊认为现如今所需要的道德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4]146}。李大钊把“大同思想”与理想、信念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大同”这一朴素思想描述未来的中国社会。

第三,友爱的观念。“仁”^⑤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孟子主张“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6]284}，“仁，人心也”^{[6]316}。人类应该“相爱”与“互助”是《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李大钊着重论述的最主要观点。“协合”与“友谊”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应该遵循的普遍法则。在李大钊看来,人类社会的生活从未摆脱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7]480}。他认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相爱互助”,人类的生活不是永无休止的争斗与掠夺,而过着“互助着、友爱着的生活”才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的著名篇章,同时也标志着其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该文中也可见“互助”思想。认为即使是在“阶级对立”的时期,“互助”的思想一直存在,因为被“经济构造”所毁灭,所以不能够实现。到了经济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伦理”的观念不被“经济构造”所毁灭。从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到经济构造建立

① 出自朱熹:《四书集注》,“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② 出自朱熹:《四书集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③ 出自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④ 出自陈澧注:《礼记集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⑤ 出自朱熹:《四书集注》,“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出自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仁,亲也,从人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

于人类互助的时期的过渡,需要“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以此来“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4]22-23}

李大钊主张“物心”两方面的改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在强调精神改造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阐述了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尽量去调动和发挥人们创造的热情,用友爱的生活代替互相残杀的生活。《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也强调人类应该向着光明一路前行,应该有“爱他”“牺牲”“忠信”“正直”“公平”等德性。

第四,儒家的修养观。儒家文化重视人生修养。李大钊认为孔子的思想,对于今天仍有价值,这种价值的作用不容轻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1]403}。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在其文章中也一直发扬“孔子固有之精华”并将儒家思想的精华“发挥光大”。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充分发扬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对自身修养与人格思想,并对“温故而知新”做出了解释。李大钊认为“温故”与“知新”绝不是相互孤立,互不影响的,而是相互依赖。“温故”作为“知新”的手段,而“知新”则是“温故”的目的。李大钊以整理历史材料为例,认为重新整理历史材料是“温故”的过程,在“温故”的过程中自然也可以得到新知。也可以用日新月异的知识去重作历史。“‘故’的是事实,‘新’的是知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人类对世界认识与探索的同时,要不断地“温故事实”,才会有所创新,涌现出新的真知灼见。所以“史学的成立,于人生修养上很有关系”^{[2]534}。

在《论语·阳货》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李大钊认为文学对人生修养与人生境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诗可以兴,可以怨,又说,兴于诗。文学是可以发扬民族和感情的,哲学于人生关系也切”^{[2]203}。认为哲学可以让人树立起一个远大的目标或者观念,这样才不至于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绊住前进的脚步,这对于人生是非常有好处的。在《史学与哲学》中,李

大钊认为学习知识,是提升自我修养的过程。知识的最重要的用途“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2]194}。因此,史学、哲学、文学与人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启迪人生,滋润人心。

第五,“刚健有为”的人生观。李大钊不仅仅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和人格魅力,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得以迅速传播”^[8],从而,中国人找到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李大钊的“出色工作和人格魅力”也正体现其“刚健有为”的人生观。

李大钊充满正义感、正能量的青春人生观,与儒家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其青春的人生观与“匡时济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李大钊曾指出“孔子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是孔子尝示人以有我矣。孟子云:‘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是孟子亦示人以有我矣。真能学孔孟者,真能遵孔孟之言者,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以行己立身、问学从政已足”^{[1]274}。李大钊主张从“物”与“心”两方面对社会进行改造。

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的不断深入,其更加注重对青年人生观的培养,把“刚健有为”的人生观提供给青年,贡献于社会。1919年3月,发表于《晨报》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告诫青年人,在新世纪的晨钟敲响之时,要尽早地确定自己人生的方向,实现人生价值。李大钊以豪迈的激情告诉青年人,寂寞中可以产生光明,萧瑟的冬天也能孕育着“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寂寞的暗夜”一定会发见出“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黑暗中孕育着创造与光明。李大钊“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中把青年、社会、责任、担当紧密地结合起来。李大钊对新时代的青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单单做到‘独善其身’^①、‘洁身自好’^②的地步”^{[7]440}是不能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李大钊认为青年人要有责任意识,其人生观已超越中国儒家文化的人生观境界。李大钊把青年看作是社会的医

① 出自朱熹:《四书集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② 出自朱熹:《四书集注》,“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页。

生,认为青年人应该以拯救社会,创造新世界作为己任。呼吁青年人应该把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用光明去驱逐“大千的黑暗”。只要光明“永不灭绝”一定会驱走人世间的黑暗。向着光明前行,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李大钊深植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人生观,也是时代所热切需要的充满着正能量、正义感的人生观。

在《论语·子罕》中有这样的记述: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李大钊把这句话视为经典,在《今与古》一文中,也用同样的话来激励青年人。李大钊认为年轻人应该有“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精神,只有这样才会有无穷的创造力,才能改变现在的世界,也才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六,节俭的思想。李大钊对儒家的“节用而爱人”^{[6]46}、“礼,与其奢也,宁俭”^{[6]59}的为政之道持肯定态度。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时,多次引用《论语》《孟子》中的名句来论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一文,李大钊论述了西方经济思想与东方经济思想的不同之处,认为西方的经济思想注重“适用与足用”,而东方的经济思想注重“节用与俭用”。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受了自然环境的影响才有这样的不同。自然的赍与啬,故人间的欲望奢,欲望奢则必竭力以求应欲而尽用;自然的赍与丰,故人间的欲望小,欲望小则必竭力以求寡欲而节用。这是东西洋经济思想不同的特点”^{[4]286}。

从以上六个方面可以看出,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与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的同时,依然能够把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此点,不仅仅是因为李大钊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有着合理的因素与在新时代生存的强大的生命力。李大钊把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新时代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有着若干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东西。

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儒家文化

与一般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有所不同,李大钊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存在的原因。

第一,用唯物史观阐明了儒家文化存在的原因。李大钊认为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存在,是因为中

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存在。按李大钊的论述,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大家族制度适应了中国农业经济的需要,也正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存在的基础。建立在中国这个大家族制度之上的政治、道德、风俗等,也可以说,它们是大家族制度的最外层的表象。

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在中国延续千年,是因为农业经济为其提供了得以存在的基础,因为孔子学说是中国大家族制度表层上的具体体现。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一直与各历史时期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顺应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

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9]。所以,永恒的道德是不存在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了,道德也与之变化。李大钊用马克思理论分析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盛行的原因。

第二,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深层原因。李大钊指出,儒家文化道德观念会随着经济变动而发生改变。经济变动了,以经济为基础而存在的道德也会随之变动。

李大钊首先阐发唯物史观的核心,以此作为自己的分析的基础。因为中国几千年的经济体系逐渐地被打破,旧的思想也逐渐地不适应其发展,新的思想才能进来。李大钊对新思想充满信心,同时也告诫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适合于闭关自守生活的旧思想也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了。新思想不是人为的,凭空造出来的,而是应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应运而生,新思想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适应了新的经济形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东南壁垒坍塌,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孔门伦理”所依赖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也使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一次强烈震动。对旧思想批判继承的同时,需要接受新思想,完成近代思想的“新陈代谢”,从而找出拯救国家、民族的思想武器。李大钊正是在寻找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的同时,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下转第 20 页)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知行合一是需要用“做人的全部代价”来支付的良知的选择。而且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结局与开始”。

知行合一显示着王阳明哲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抗拒口耳之学,坚持身心之学。这看似简易,做到却着实难。知行合一强调把知落实到行上,针对的是整个官学体系及绝大部分读书人的现行做法,挑战了通行的借圣学来谋取高官厚禄的学风士气,正如他在《书林司训卷》中所说:

“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甚,不复有明德亲

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①

王阳明认为功利世风之所以能相扇成习,盖在于国家取士与士人读书应试,都可以“将知行截然分作两件事”,人成不了“真切笃实”的人,国家也拔不出“真切笃实”的人才。满街头顶圣贤大帽子的衣冠禽兽,逢场作戏,假人言假事。王阳明虽为“吃紧救弊而起”,但他自信“知行合一”之说,并非权宜之计,是把握了本来如此的“本体”之论。

(责任编辑:李亚平)

(上接第 12 页)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0]。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全世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11]。只有对待传统文化持科学态度,才能深刻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一直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对待儒学的态度影响深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自李大钊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采取的“一以贯之”的科学态度。坚持从中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中汲取精华,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滋养,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 周策纵.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 周子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4]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5] 刘桂生. 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6] 朱熹. 四书集注[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7]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8] 王宪明,杨琥.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20-127.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1.
- [10]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02).
- [11]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2014-10-14(01).

(责任编辑:夏玉玲)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82 页。